

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

广东省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省港大罢工·

- 回忆省港大罢工 黄 平(3)
- 回忆省港大罢工诸事 罗 珠(47)
- 回忆省港大罢工 罗 珠 彭松喜 梁梅枝 张国梁(54)
- 参加省港罢工回忆 黄 平(66)
- 省港大罢工的几个问题 黄 平(81)
- 省港大罢工回忆 魏鉴贤(94)
- 在省港大罢工的日子里 徐惠东(99)
- 回忆省港大罢工 周江全(105)
- 对罢工发动前后及斗争策略的回忆 罗 珠(108)
- 香港罢工中的几个策略问题 饶卫华(122)
- 香港大罢工回忆 梁梅枝(126)
- 回忆省港大罢工 白洁之(131)
- 省港大罢工爆发后香港各方面的情况 张国梁(137)
- 省港大罢工回忆 梁复然 郭瘦真(142)
- 省港大罢工回忆 梁国志(144)
- 省港大罢工的回忆 饶卫华(153)
- 从“特许证”制度到《工商善后条例》 罗 珠 彭松福(157)
- 参加省港大罢工的一段回忆 冯 燊(172)
- 参加省港大罢工的点滴回忆 周 材(174)
- 省港罢工中各业罢工情况 罗 珠 彭松福等(178)

省港大罢工前后的香港海员·····	方世林(188)
省港大罢工中的电车工友·····	徐楚南(199)
“澳大利皇后”船海员参加省港大罢工回忆·····	王 永(201)
省港大罢工前后的广东平民教育运动·····	林增华(203)
法大纠纷事件·····	陈均平(209)
机工罢工的酝酿发动与“小社”的活动·····	罗 珠(219)
工人的喉舌《工人之路》·····	郭瘦真(225)
海军船坞工人罢工斗争·····	张国梁(248)
省港大罢工前香港党的组织·····	梁复然(253)
大罢工后海员中党员和团员分布情况·····	方 才(258)
罢工前后党在香港知识青年中的活动·····	陈均平(260)
省港罢工中的工农联盟·····	黄求实(266)
干事局及其所属各部门·····	罗 珠 彭松福 张国梁(268)
会审处的工作情况·····	彭松福(271)
交通部发放通行证的权威·····	彭松福 张国梁(277)
广州接待罢工工人片断回忆·····	罗 珠(278)
招待部的权威·····	李美涛 李沛群(279)
省港大罢工片断回忆·····	李 甫(280)
工人中医院·····	黄冠生(282)
关于广州工代会·····	梁国志(283)
宣传学校和宣传队·····	苏其德(289)
省港大罢工期间的劳动童子团·····	郭瘦真(293)
回忆省港大罢工中的舰务工作·····	黄 德(303)
回忆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一)·····	甘 来(306)
回忆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二)·····	甘 来(311)
省港罢工斗争中的铁路工人纠察队·····	李 甫(320)
关于纠察队的回忆·····	周江全(326)
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概况·····	王尚卿(328)

纠察队的训练及其封锁斗争·····	黎子云(335)
工人武装——罢工工人纠察队·····	魏鉴贤(337)
沙鱼涌之战·····	魏鉴贤(344)
参加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的回忆·····	叶尚真(347)
对工人纠察队的点滴回忆·····	陆 鉴(350)
关于发动罢工和纠察队缉私的回忆·····	陈 卓(352)
省港大罢工中的广州工人运动·····	罗 声(356)
广州沙面洋务工人的组织及罢工经过·····	梁国志(365)
省港罢工中的广三铁路工人运动·····	李美涛(374)
省港大罢工中的广东学生运动·····	王克欧(379)
关于汕头对外罢工·····	陈均平(390)
省港工会统一运动的点滴回忆·····	黄求实(404)
与黄色工会的一场斗争·····	彭松福(406)
罢工的发动及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郑 全(410)
黄埔军校检查轮船经过情形的回忆·····	张琨理(417)
回忆省港大罢工中的邓中夏·····	黄 平(422)
邓中夏同志与省港大罢工·····	罗 声(431)
邓中夏同志的革命风范杂忆·····	赖先声(450)
邓中夏同志对组织工人阶级武装的贡献·····	陈均平(463)
与邓中夏在一起的日子·····	罗百良(467)
跟随邓中夏视察二三事·····	陈岳洲(475)
干事局局长李森同志·····	罗 声(478)
蓝裕业与《工人之路》·····	郭瘦真(490)
回忆我的丈夫何耀全同志·····	吴丽贞(495)
省港大罢工中的梁培基·····	梁尚农 梁尚博(499)
持平工会和黄金源·····	陆 鉴(504)
对省港大罢工中诸人物的回忆 ·····	罗 珠 张国梁 彭松喜(509)

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的回忆·····	陈 谦(524)
省港大罢工宣传工作的回忆·····	郑 全(531)
“六·二三”反帝示威与《工人之路》特刊的创刊·····	郭瘦真(537)
省港大罢工和沙基惨案·····	韩继汉(541)
香港海员罢工领导人陈炳生二三事·····	卢子正(544)
记省港大罢工工人纠察队总队长黄金源 ·····	黄松森 黄杞云(551)
关于早期工农运动的情况·····	林务农(558)
大革命时期广州地区妇女运动回忆·····	谭竹山(570)
对邓中夏烈士的一些回忆·····	谭天度(580)
附录(英文史料选译)	
香港:1925—1926年有关罢工和抵制的通讯·····	(586)

·港澳华侨史料·

两次去危地马拉的见闻·····	霍卓其(635)
侨居哥斯达黎加的回忆·····	余炜光(639)
印尼客属总义祠与义成学校·····	林琼光(646)
几个印尼侨领的发家史·····	陈显彰(651)
军统特务林川小组在印尼活动始末·····	李金汉(658)
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记略·····	黄略汉(662)
印尼邦加华侨概况·····	周 灿(670)
马来亚华侨学校师生抗日救国活动的回顾 ·····	卢绍策 王静英(687)
抗战结束后香港九龙城恢复设治事件的回忆 ·····	林侠子 方遐君(700)
香港东华三院见闻杂录·····	亦 存(710)
香港话旧·····	陈 谦(728)

香港同善社侧记·····	张子燮(762)
“二战”期间的军统特工澳门站·····	洪 涛(769)
忆菲律宾马尼拉的全民书店·····	李清泳(777)
抗日战争后期越南华侨抗日活动纪事·····	郭伟波(782)
旅古巴华侨生活斗争史略·····	段克诚(791)
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华侨学生概况·····	曾其清 曾俊伟(809)
热血染东江 侨史放光芒 ——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概略·····	陈牧汀(816)

省港大罢工

回忆省港大罢工

黄 平*

一、有关省港大罢工问题的解答

我想按照提出的问题作答，因为我还来不及回忆和分析全部过程：

(一)我到香港之前，那里已经有党的组织，党员有李义宝(有些人名字记不清)，小学教员，他在罢工后病故。还有一位视学员林昌炽，罗珠当时也在港，大概他会记得起各人人名。我到之前似乎只称为小组，负责人似乎是李义宝或那位视学员，罗珠大概记得。全体同志不过几人。

(二)“五卅”惨案前后区委书记是陈延年，组织部是穆青，军委是周恩来，工委是冯菊坡或刘尔崧(后来我知道肯定是刘尔崧)，农委是阮啸仙，妇委是高恬波？青委？宣传？区委就是由以上各部委负责人组成，并无不负责部委的人参加区委，这种办法一直到“广暴”都是如此。

“特委”这一名称，似乎后来认为区委这个名称不大恰当，因为它还要照顾广西的党组织，至于改用什么名称(特委或其他名称)我却记不得了，很可能是“特委”，以别于其他区委。但是无论是什么名称，在延年当书记时期，广东党组织领导成员只有个别变更，但没有什么超乎“区委”之上的组织。比如，工委在省港罢工后几个月(1926年?)改为黄平(刘尔崧负责广州工人代表会工作)，组织改为穆青，宣传后来改为任卓宣，妇委改为蔡畅(可能蔡畅会记

* 黄平当时与邓中夏、廖仲恺、杨匏安一同担任省港罢工委员会顾问。

得名称究竟是什么)。

(三)二次劳大及全总成立后,党对广东和香港职工运动似乎没有什么改变,在广州仍然以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为中心推动工作,争取在广东总工会和机器工会下的群众组织和没有组织的工人,全总是否有什么指示,我不知道。罢工后,全总忙于罢工工作,也无暇照顾广州职工运动了。

肃清杨刘的决定,与罢工无关,而是建立广东国民革命根据地的一个步骤,无论是东征、南征都是鲍罗廷同国民党决定的,党组织并不过问,不过派有周恩来参加,党是事前知道的。

这里顺便说明一声:鲍罗廷是孙中山向苏联政府请来的政治顾问,他的工作向苏联政府负责,不受中国党的约束,同时他也没有权利和义务过问中国党的事情,他和广东区委的关系完全是一种非正式的,他需要中国党在军队和政府里工作,而广东区委也需要他帮助在军队和政府中开展党的工作。在几年的工作过程中,换句话说,1925至1927年在广州工作的时候,我几乎参加了陈延年、邓中夏、苏兆征同鲍罗廷的所有会见。我从来没有发现他们之间有过什么意见分歧,双方都是互相信任,互相尊重的,会见都是非正式的,既无主席,也无记录。

(四)上海“五卅”惨案发生时,我在香港,不知道广东区委和全总有何决定。邓中夏来港,我才首次知道他是来组织香港总罢工的。

(五)中夏来港前,港支部只是一般地秘密进行宣传工作,并没有想到联合各工会的领袖来进行宣传,更想不到罢工了。苏兆征当时已在香港,他还没有入党,他是经常在香港海员工会工作,他允许我们共产党员在星期六的海员群众会上演讲。香港工人和市民恐怕只知道一点关于惨案的事,因我们的宣传是极微弱的,一般市民的愤恨是可想而知的,但是我举不出事实。

(六)中夏同志只是简单告诉我他来港的意图,我也没有想到

请他详细同支部谈谈,他是直接同苏兆征一起到工团总会去活动的。

(七)我完全不知情。

(八)我不知道中夏事先是否同国民党谈过,我想他是不会的,当时国民党的左派软弱和人少,无暇想到罢工问题,而党和全总的活动素来独立,大概不会去事先商量的。

(九)我不知道这些传单,也没有看见过。

对学生可能是没有做过工作的,当时党内似乎没有学生党员,一部分香港学生是罢工后自动回省的。

(十)中夏离港时,说回去请求批准,从此就没有回香港了。批准的消息是怎样直接传给香港工会的,我不知道。

(十一)撤退工人回省完全是各工会自己办的,党组织没有布置地下工作,工会也没有长期留下一部分工人在企业中活动,只有李义宝(?)留在香港。

(十二)支部全体随罢工工人回省,只有李义宝留港。

(十三)省港罢工完全是全总的党团即罢工委员会的党团领导的,书记是中夏,他时常和延年商量,必要时还去同鲍罗廷商量。罢工中有许多问题是同政府有关的,例如罢工工人住宿问题、伙食问题、封锁香港问题、特许证问题、同国民党右派(吴铁城、卢兴源等)冲突问题等等,都必须使鲍罗廷知道,以便在国民党政治会议上协助。中央远在上海,又是处于秘密状态下,不但对罢工没有指示,即使对广东区委也没有什么指示。

罢委党团和区委通过中夏和延年一直保持密切关系,意见也是一致的,对罢工的屡次谈判也是共同与鲍罗廷顾问一起拟出来的,可以说想尽办法来解决罢工,但是香港政府希望反革命改变而不肯解决。如果要追问广东区委对罢工前途是怎样估计的,那么我以为当时对罢工前途是没有明确估计的,正如同时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广东局势的发展没有估计一样,在当时反革命一天天抬

头的形势下,要香港屈服是不可能的。

(十四)罢委会及其一切组织都是中夏同志根据形势的需要逐渐提出,逐渐完善起来的,也是由他起草的,只有罢委会和干事局是一开始他就草拟出来的。

区委和全总党团的关系是没有明文规定的,全总既然是全国性的,那党团似乎应该由中央领导,中夏是中央委员(我当时是不知道的,可见人们并不重视,中夏本人也从来不说起),而他不是区委委员,实际上全总的工作,尤其是罢委的工作必须有地方党组的支持才能做好,因此中夏常常与延年商量,而延年从来也没有对中夏或党团下过任何指示。他们两人都是极其实事求是的人,从来没有拘泥于形式。罢工是由全总罢工党团领导,区委只是通过党团来领导罢工,事实上也只能如此。

(十五)罢委和干事局人选是党团决定的,重要的人选如委员长、干事局长、纠察队长是中夏和延年商量过的,这些事情从来没有同国民党商量过。当时的情形是:国民党中央党部是在左派手里,但实际工作都是共产党员在做,如组织部的秘书杨匏安、工人工部秘书冯菊坡等都是实际执行人,所以要同国民党商量也就是同他们商量,至于廖仲恺、汪精卫,他们身兼数职,除了重大问题之外,是无暇顾及的,蒋介石只管军事,中央党部根本不管,他的势力还薄弱,正需要廖、汪与鲍罗廷帮助他发展,当然不愿在中央党部和罢工问题上引起冲突。

(十六)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纯粹是为了组织群众、教育群众,使黄色领袖不能欺骗群众而设立,并没有任何人提到它成为第二政权的可能性。事实上它是香港和沙面工人的代表会,不是广州工人的代表会,也不能起当时彼德堡苏维埃的作用(如果当时党已经想到夺取政权的可能性的话,大革命也不会那样失败了!),只有香港的英文报纸说代表会是“国家内的国家”,其用意是为了挑拨而已,就是广州工人代表会也没有把这种可能性提到日程上来,只是

事后客观上看,罢工工人代表会具有一定的政权性质。

(十七)中夏的文章从来没有经过区委讨论,正确点说,他的重要文章是根据邓、陈、鲍的决定写的,当时没有区委审查文章的做法,工作很忙,文章由主编看了就算了。

(十八)罢委党团开始时包括所有有关的党员,如邓中夏、林伟民、李森、罗珠、黄平和参加罢委各方面工作的几个党团员如《工人之路》的编辑等。后来党员增加了,我的工作也调了,党团的具体成员和组织,我不知道。

“反对国民党过问罢工运动”这问题我今天才知道,我不记得当时有人提这个问题,事实上,我们请一些国民党要人到代表会做报告,我不知道有什么国民党人想到罢工工人中来活动,因为罢工是共产党一手组织起来的,群众中右派政客是跑不进的。

(十九)当时经常在广州的中央委员有毛主席和邓中夏,区委从来没有把毛主席介绍给我们,1925年以前我不在广州,不知道,中夏是中央委员这也是我没有听人说过的。毛主席从来没有参加过区委会议(1925年以前我不知道),所以大家都不大知道毛主席在做什么,到了他担任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之后,才稍为知道一点。

鲍罗廷从来没有出席过区委会议,他曾经应延年之邀到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上做过报告,谈形势问题,是由我翻译的,地址在省农会。他在一次报告中说到要扫除革命道路上的一些玻璃瓶,否则革命这个汽车前进就要受到阻碍,这是说当时肃清反革命和统一广东以及反对右派的必要。

这里谈谈我的看法:鲍罗廷是孙中山向苏联政府请来的最高政治顾问,他和中国共产党是无关的,常来中国的第三国际的代表是伍庭康(音译名),所以鲍罗廷没有指导中国共产党的权利和义务。不过,实际工作中他需要区委的协助,如选派干部到军队中做政治工作,选派党团员参加黄埔军校等等,同时区委要发展工作,

也需要鲍在国民党中的协助,省港罢工后更是有许多问题要通过鲍向国民党提出,例如,罢工维持费问题就需要鲍同廖仲恺说妥,再由中夏和兆征去找他。

在几年工作中,鲍、陈、廖之间形成了极其友好的合作关系。

(二十)区委认为廖仲恺是国民党中最左的了,我在广州期间,据我所知,延年从来没有与廖仲恺或其他国民党人见面,只有一次经苏联军事顾问的邀请,延年和陈铭枢见过一次面,因为他们法国曾经认识,与廖仲恺联系的有中夏、兆征,接洽的都是关于罢工的事,区委当时和国民党或国民党的某个人是没有什么会商的事情。

(廿一)我不知道所有列举的右派人物,但是可以猜测他们不是在某一个问题上同廖仲恺和中共有冲突,而是根本反对中共和联合中共的廖仲恺。

我不知道许多他们当时反共的事实,因为我的工作与他们接触不多,而且他们反共、反罢工的事实不都是公开的,除了某些事件之外,不过我也知道一些事实:

吴铁城命令他的警察向罢工工人开排枪和其他一二件在《工人之路》上发表过的事实是大家知道的,我不谈。有一次,在中山舰事件之前,吴铁城的警察把一位苏联军事顾问团中的一位铁甲车手(也许是坦克车手)扣留在东山派出所里,借口说他的汽车开得太快,后来放了。当天下午罗加卓夫顾问(加伦当时不在广州)带我一起为了此事去见吴铁城,吴铁城还是说车子开得太快了,罗顾问没有表示态度,只是随便寒暄几句就走了。其他广东同志一定比我知道多,可以问问他们。

(廿二)纠察队的建立是中夏为了阻止走私、封锁香港和维持罢工秩序而提出的,他和延年曾为纠察队事前后找过鲍顾问数次,因纠察队需要枪支、轮船等都必须通过国民党,纠察队的成立是延年和鲍顾问都赞成的。国民党左派如廖仲恺是赞成的,右派当然

反对,不过不敢公开说出来,而只是借口某些事件来反对,如中夏所说的伍朝枢在政治委员会里经常反对纠察队和罢工的活动那样。

(廿三)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罢委的各种组织须经国民党中央,国民党中央也没有提出这种要求。

(廿四)封锁香港是罢工的生死问题,左派业已同意,国民政府无理可公开反对,各界人士前往香港由罢委核准,国民党人也无法公开反对。

(廿五)廖仲恺被刺后,罢工政策似乎没有改变,不过马上加强了防止反革命暗杀的阴谋,鲍顾问、政府各要人、苏兆征从此都有卫队保护出门,提高警惕了。鲍顾问和苏兆征的卫队都是工人党员。

(廿六)当时的国民革命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这一点可以说也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右派所不同的,也是共产党经常强调指出,经常与国民党各派别争辩的问题。省港罢工也是受了这种影响,开始不自觉地变成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罢工不久就发现了许多矛盾,例如粮食、煤炭、煤油、汽油等物资不足,因为广州长期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但粮食、燃料这些主要物资仰赖于人,即使轻工业的日用品也靠进口,日子久了,居民感觉不便,商人也无利可图,国民党内的反动派更振振有词。我记得有一天晚上,中夏、延年和我一起到鲍顾问那里去,苏兆征入党后也经常参加这种会议的,当时他是否已经入党,我不记得,所以记不得他是否也去了。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这种情况,大家认为,罢工像一把两边都锋利的刀一样,可以对敌我都不利,因此我们必须使罢工这个武器反帝,而不要反对自己,决定的办法是“凡不是英货英船及经过香港者都可准其直来广州”。这样一来就保证了广东的粮食、燃料和必需物资的来源,民族统一反帝战线的继续,同时也剥夺了反动派的借口。

后来由中夏将这一决定传达给罢工党团、全体党团员和全体

工友,获得大家的一致赞同,没有听说党内或罢工工友中有什么反对,我想也不可能会有什么反对,因为这个政策的正确性是每个罢工工人所能够理解的,何况中夏的文章和口头报告都是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

(廿七)解决许崇智的粤军,像东征南征一样,是整个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的决定是鲍顾问与国民党左派决定,并由鲍顾问通过国民党执行的。东征南征等等具体计划,鲍顾问从来不同延年商讨,延年也不过问,就组织路线来说,这种关系是正常的,因为鲍顾问是代表苏联政府而不是代表党,与中国共产党只是维持一种非正式的关系,党当时也没有参加国民政府,所以也不参加它的会议,但是每次出征的计划延年知道的,党总是配合国民政府的革命措施,例如举行肃清反革命示威游行之类的活动,往往都是陈、鲍、邓会商决定的。

(廿八)这一问题的含义我不大明白,可能答非所问。

(廿九)我不记得区委或陈延年分析过国民党的各个派别,人们脑中都是以廖仲恺、甘乃光、汪精卫、蒋介石为左派的代表人物,中山舰事件前后就把蒋勾销了,又把廖、甘为左派,北京来的顾孟余也是认为左派,邹鲁、戴季陶、伍朝枢、吴铁城、马超俊等为右派代表人物,中派似乎不大谈起,至少是我头脑中没有这种人物。

我记得,西山会议后孙文主义学会在黄埔与各校学生中的活动,蒋介石要求共产党交出军队中共产党员的名单,直到中山舰事件发生,党员和一般罢工群众都在问: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前途将会怎样?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在区委会上讨论过,陈、邓、鲍之间也未讨论。我现在以为延年看见了这个问题,不满意中央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但是自己也没有提出什么积极的办法,大概也是想不出什么办法。比如,延年、太雷和中夏常常私下说:中央要我们联合左派,但是谁是左派?意思是说:国民党没有什么可靠的左派。另一方面,有一次鲍顾问把国民党的左右派比喻为一套立着的纸牌,